

政治

本位与范式： 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的五种影响

朱红根 王志远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围绕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此起彼伏，美国积极向中亚发展，“9·11事件”之后更是提出宏大的“大中亚计划”，随后遭遇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集体“排挤”，中国则相对平稳地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伙伴关系。中俄美三个大国的战略在中亚的交织，加上西向伊斯兰地区以及北向欧盟的影响，使得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更加错综复杂。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需要在相对广的空间和相对长的时间中寻找带有规律性的“本位与范式”，在此基础上结合中亚地区内在的地缘、外交等方面特征，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亚国家 大国博弈 地区安全 本位范式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6-0042-0014

在地缘层面，一般将中亚地区理解为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因此也有中亚五国的称呼。显然，这样界定稍显狭义，忽略了空间和地理等很多内容。苏联时期，曾经有一个更加狭义的“中部亚洲”（Средняя Азия）概念，这其中甚至不包括哈萨克斯坦，一度存在“哈萨克斯坦与中亚”之称呼。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其他国家的倡议与支持下，哈萨克斯坦宣布自己属于中亚国家行列。自此，在国内外学科设计和专业研究等领域，中亚五国与中亚地区几乎等同，并且大多数分析都基于这种概念。而如果按照地形地貌以及空间地理位置等方面对中亚进行概括，除了中亚五国

之外，还应当包括全部覆盖其国家领土的阿富汗，以及包括覆盖其国家部分领土的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的意思，范围要大于前面提到的“中部亚洲”。这两个概念对于讨论当前问题都有所帮助，在“中部亚洲”范围内，层层叠叠交织着激烈的大国竞争与博弈，五个国家具有较为相近的独立时间和外交轨迹，范围上也相对容易界定清楚，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国博弈的本位与范式，有益于构建更具抽象性和前瞻性的分析模式。而在“中央亚洲”基础上，则拥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这样可以使研究变得更加具体和现实。简单说，前者是当前讨论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本

【作者简介】朱红根，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远，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14CGJ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2015M570313）阶段性成果。

文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后者则是在现实地理版图中检验和说明本文分析方法的基本条件。这样做，并非在概念间随意转换，而是为了尽量遵循条理清楚和逻辑一致。

一、“冷战”后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向终结，原有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其中既有独立诉求强烈、努力回归欧洲的波罗的海国家，也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这样通过“公投”直接促使苏联解体的主导国家，还有措手不及、被动接受进而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中亚国家的情况大多属于后者。新独立国家面临着“怀旧”与“独立”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影响。一方面，“苏联化”并没有在中亚消失，反而以“俄罗斯化”形式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倾向与国家认同，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构建起来。然而，无论这两种思潮如何发展，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原本作为强悍大国的组成部分，如今只能作为分散的小国存在”。1995年，中亚地区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在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签署“核保护”协议后，主动放弃境内苏联时期的核武器。这标志着该国已经定位于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小国”身份。在中亚的东南部，塔吉克斯坦内战自打响到结束，前后经历八年之久，其间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参与了维和，但直至千年之交联合国安理会才认为该国恢复和平状态。这说明，尽管苏联解体没有经过武装冲突而“文明离婚”，但局部冲突却无法避免，而且作为地区大国的俄罗斯，对于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掌控，实际上也接近“鞭长莫及”的境地。

作为“冷战”胜利者，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轻易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时的美国，刚刚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获胜，对于世界能源市场已经拥有了实际意义上的控制权。而如果能够将中东与中亚这两个地区的能源开采有效衔接并加以控制，对于掌握世界能源格局都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里海”及其周边国家所蕴藏的丰富石油天然气，促使美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参与到里海油气开发和中亚地缘政治这两大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能源企业广泛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勘探与开发，并通过持股或贷款等方式获得中亚国家的授权和认同。此时，百废待兴的中亚国家，经济刚刚

脱离苏联模式，虽然也曾经寄希望于俄罗斯或是独联体来挽救颓势中的国家经济形势，但集内忧外患于一身的俄罗斯对于后苏联空间的掌控已是有心无力，加之叶利钦政府“一边倒”地亲近西方国家，希望获得更多支持与援助，中亚地区的大国竞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占据主动。不仅如此，从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铁幕”消失后的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经济一体化过渡。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也是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之时。此后，欧洲国家也通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配合美国向中亚地区安全领域挺进。

苏联解体对于中国来说，有利之处在于西北地区的战略压力骤减。此外，中国对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也格外重视：1992年1月2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交；1992年1月3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建交；1992年1月4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建交；1992年1月5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建交；1992年1月6日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建交。中国的外交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苏联解体后的地区权力方面，而是更多关注边界问题、地区安全、对外贸易等领域，并不打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博弈。此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改革、发展、稳定三个核心要素推动下，对外战略取向也相对明晰。边界问题是中国与新独立中亚国家必须厘清的问题，但又不能因此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初期中国新疆发展稳定形势受到严峻挑战，极端宗教势力、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已经初现端倪。

中亚国家与中国新疆有着3000千米的边境线，这一地区既是境外“三股势力”向中国渗透的“依托”，也是中国维护新疆稳定的“缓冲带”。因此，一个带有矛盾性的难题开始摆在中国面前，即如何在新疆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又能够保护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显然，解决这些客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能否达成共识，并且需要做到兼顾这些国家自身存在的特点。总体上，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基本保持良好关系，这得益于中国采取的睦邻、友好、合作的对外政策，此外，还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亚国家自身秉持的“去苏联化”和“去俄罗斯化”，在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固然需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援助，也需要尊重本国独立的平等外交模式，而中国

的外交态度非常符合中亚国家的价值取向；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政外交乏力，亲眼目睹美国等西方国家挺进中亚，又无力竞争和博弈，中国这种较弱姿态的合作模式，实际上也容易得到俄罗斯的默许和认同。这样，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90年代逐渐实现了边界问题、地区安全、经贸合作的协调与配合，并成功将原本用于划定边界的“上海五国”，在2001年组建为以中国地名称谓命名的“上海合作组织”，一举囊括了边界、安全、经济等诸多合作领域。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租用了军事基地。此时，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处于相互妥协的氛围中，两国在很多事件上的态度和立场较为一致。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略，也为中国维护西北地区安全提供帮助，“9·11事件”促使美国将“东突组织”列入恐怖主义范围，中国在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方面开始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与配合。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取得战果并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全球反恐模式启动的同时，也进入了美国式民主模式的灌输阶段。然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赢得战争并不表示美式民主模式可以落地生根，各种暴力恐怖势力层出不穷，反而使美国深陷战后治理泥潭，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尽管如此，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却更加坚实，并且对周围国家的影响也日益加深。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这三次“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颜色革命”，不仅表现形式相近，结果也高度一致，都直接导致政权更迭，更为重要的共同点是“背后都有美国全球民主输出的痕迹”。这既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也引发了中亚国家的普遍不安，原本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此后却开始面临“剧情反转”的尴尬境地。

2005年5月，在亲近西方、疏远俄罗斯的“古阿姆集团”中，乌兹别克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几天后在费尔干纳盆地就爆发了“安集延事件”。前者标志着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决意疏远美国，因为乌国看到了“颜色革命”制造的影响，后者则使乌国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2005年，也是俄罗斯促使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的一年，原本游离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之外的乌兹别克斯坦重回与

俄罗斯合作的框架之内。这一年，俄美在中亚地区的较量中，俄罗斯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美国则步步后退。表面上看，俄美之间较量与角逐似乎对于中国有利，但实际上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在中亚开展经济合作时总是不得不充分考虑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领域也进入“平台期”。显然，俄罗斯所屏蔽的不仅是美国，俄罗斯要重新获得中亚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既包括地区安全，也包括经济主导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忙于“反危机措施”和“阿富汗撤军”的美国，并没有停止逐鹿中亚地区的脚步，国务卿希拉里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意在重新整合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而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俄罗斯，先是在2011年7月将“俄白哈关税同盟”坐实，进而在2012年普京竞选总统期间高调提出“欧亚联盟”，此后则是迅速地扩大成员国范围，并实现机制设计升级，目前“欧亚经济联盟”已经拥有五个成员国。2013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并且选择在哈萨克斯坦以总统名字命名的大学宣布，充分显示出对于中亚国家的高度重视。

自此，一场由中俄美三个大国所导演的战略博弈，清晰地展现出来，对于其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当然，考虑到中亚地区的地缘特点，来自中东方面的伊斯兰教影响以及欧盟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也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之所以很多研究都建立在中俄美框架下进行讨论，主要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对中亚地区影响力最大，并且已经形成地区影响的“极”，而其他国家显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①。本文希望从外交和地缘两个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客观上需要尽量照顾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主要影响。本文认为具有规律性和主导性的影响共有五种。

二、中亚地区交织的五种“本位与范式”

在理论上，美国学者凯文·纳里泽尼将战略“简要地界定为行政决策者或决策机构追逐其国际政治目标的一般原则”^②。从这个角度看，战略与对外

① 赵华胜：《中亚与大国关系》，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

② [美]凯文·纳里泽尼：《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白云真、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政策之间有着相近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战略视角更高、更具抽象意义，并且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规律性等特征，而对外政策则具有偶然性和短期性。但从一个国家长期实行的对外政策中，可以分析出其战略的基本模式与特征，从中总结出战略所具有的“本位与范式”。这里的本位并非强调自身利益，更多含义是指一个国家的战略基本特征，范式则是由本位出发在对外政策中所秉持的基本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位”决定了“范式”，对外战略的“范式”调整，大多离不开“本位”这个核心要素。对于分析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来说，首先需要寻找多年来影响中亚地区的各种战略“本位”，才能讨论交织在一起的战略“范式”，进而讨论大国竞争与博弈未来发展趋势。为了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本位与范式”这两个概念，在地域上不能局限于“中部亚洲”，而是应当扩大到“中央亚洲”范畴。而在时间方面，同样不能仅仅讨论苏联解体之后的大国战略特征，毕竟很多带有“本位”特征的战略，虽然本身带有连续性特征，只不过在“两极格局”时期被掩盖了。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界定下，讨论中亚地区大国博弈，需要分析西北方向的欧盟（欧共体）、东北方向的俄罗斯、西面的阿拉伯世界、东面的中国以及国家战略覆盖全球的美国。

（一）美国的“霸权本位”与“控制范式”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一举建立起世界霸权国地位。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推行，“霸权稳定论”也应运而生，“按照这种理论，霸主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①。并且，这种逻辑还被推广到军事、安全等国际事务领域，罗伯特·吉尔平本人是自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霸权稳定”观点以来，对“霸权稳定论”诠释得最具体系的学者。依据这种逻辑，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获得的各种战略利益，实际上都可以作为其提供“世界性公共物品”而引发成本的合理补偿。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基本也遵循着依靠霸权进行国际治理的逻辑。因此，美国对于中亚的态度，仍然是以公共物品提供者身份来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各种战略。

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则来自于地理学领域，美国

与中亚的交通距离，几乎等同于半个地球。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需要经过太平洋，再跨越亚太诸国，才能抵达中亚。而从美国东海岸出发则需要经过大西洋，再跨越欧洲和中东国家，才能触摸到中亚。通过最基本的地理学常识，就可以判断出美国若要控制中亚至少需要克服空间和地理上的诸多难题。

对于美国霸权战略与地理之间的矛盾，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可谓一语中的，“美国与中亚地区的距离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获得完全主导权，而美国的强大却使其足够可以干涉到中亚地区事务”^②。美国的强大，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领域，再加上对全球能源的控制力，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基欧汉曾经对“经济—军事霸权”有这样的描述：“霸权国家要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去组织和扼住其他国家可能的进入或关闭世界政治经济中重要领域的企图。但是在当代世界，不管怎么样，一个霸权国家很难和它的军事伙伴或军事同盟一起，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去维护其经济政策目标。”^③美国对于中亚这样遥远的地区，所采取的办法与这种描述几乎如出一辙。苏联解体后，美国先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制俄罗斯，再用美元敲开中亚地区的大门，从而实现遏制俄罗斯、掌控里海周边石油资源的目标，这对于维护“军事—能源—美元”霸权结构至关重要。而在“9·11事件”之后则依托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巩固自身地位。

对美国来说，最为理想的顶级霸权模式是“权力、制度、观念”的多重结构，事实上，这种模式在美国很多“小伙伴国家”都保持得非常稳定，效用最佳。依此模式，美国支持“古阿姆集团”，也支持在“后苏联空间”的“颜色革命”。然而在该地区，美国取得的效果却远不及“军事—经济—能源”霸权结构那般奏效，甚至引起了中亚国家普遍反感以及俄罗斯的激烈反应。中亚及其周边国家的集体抵制，直接导致俄美在中亚的博弈中俄罗斯逐渐超越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2005年夏季,弗雷德里克·斯塔爾在《外交》杂志撰文提出“大中亚计划”,其中不仅包括中亚五国和阿富汗,还囊括了中国西北部、印度北部、俄罗斯南部地区,其中深意在于利用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果实,通过巩固美国势力范围实现霸权扩张。然而,“大中亚计划”有一个必要前提美国始终没有实现,就是尽快稳定阿富汗局势,形成对区域的辐射^①。美国将原属于国务院欧洲局管辖的中亚事务,整合为中亚南亚事务局,其举措与“大中亚计划”严丝合缝,但实现路径上却截然不同,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将其称之为“新丝绸之路计划”。在这种部署中,有一个全新的理念出现在美国中亚战略中,就是不再完全依靠阿富汗局势,而是以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的方法,将中亚的经济利益逐渐与南亚衔接起来,以此实现美国对中亚国家的长期持续影响。近年来美国最希望实现的就是将中亚天然气引向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将南亚的电力输向中亚,再辅必要的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手段,以此获得对中亚和南亚的控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丝绸之路计划”已经不再如同“大中亚计划”那般雄心勃勃,而是一个更加务实的经济战略。而美国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实现在中亚地区的“霸权”,主要的实现方法始终采取“干预”范式。

(二) 欧盟(欧共体)的“秩序本位”与“间接范式”

历史上,欧洲对于中亚的影响可谓直接,古罗马帝国、中亚帝国、中华帝国的影响曾经交织于此,随着俄罗斯崛起控制中亚,近代以来大国力量并存格局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②。从当前的形势看,欧洲对于中亚地区的影响不仅日渐式微,而且也不再直接,这与欧洲追求“多极均势”的自身发展规律密切相关。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始终在向着“多极均势”努力。尽管两次世界大战都从这里打响,但每次战后重建的核心,都强调国际秩序。这些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实力所获得的和平很难自然存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一战和二战之间曾经出现过“无秩序和平”状态,最终表面的和平被暗流涌动的法西斯主义打破。因此,卡尔曾经将这一时期状态概括为“强制下的和平”^③。二战后,欧洲诸国为了构建地区秩序,逐渐走向融合,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

表现出“超国家”特征。苏联解体后,欧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逐渐将东欧国家纳入到自身秩序体系,顺利实现了“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这种情形,在美国看来是实现了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俄罗斯则因此倍感压力。然而在欧洲视角看来,这并非单纯是经济联盟扩大和安全范围扩大,其中深意更在于“秩序”的推广。为此,基辛格曾经这样评价,欧洲“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④。应当说,在全球化时代,欧盟的秩序除了对区域内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之外,中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的“多极均势”早已无须维护,因此欧盟的“秩序本位”对内表现为地区安全,对外则表现为全球范围的“多极均势”,当然这需要借助于西面美国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来平衡来自东部和南部的潜在威胁。2012年,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应当说就是对这种“秩序本位”的最佳注解。

可以注意到,在28个北约成员国中,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比较特殊,这两个伊斯兰教占主要地位的国家,有助于保持欧洲边界的稳定,也有利于北约维护地区安全。然而,他们加入欧盟的难度却极大,主要原因在于宗教信仰所引起的文明隔阂,近年来一系列极端宗教事件在欧洲出现后,更是将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降到几乎为零。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曾经预言,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⑤。这说明,在欧盟所强调的“秩序本位”中,有着一个明显的“地域、制度、文明”界限,只有当这些条件全部满足时,才可以进入到这个体系。与之相比,尽管俄罗斯大部分人

① Лукина. Иде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Июль 2014, № 7.

② 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③ 参见[英]E. H. 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徐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④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前北约和欧盟均有28个成员国,其中属于北约不属于欧盟的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非欧洲国家),挪威和冰岛(不愿加入欧盟),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欧盟不接纳)。而属于欧盟不属于北约的大多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奥地利、塞浦路斯、马耳他、芬兰、瑞典、爱尔兰。

口都居住在领土的欧洲部分，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仍然存在着天然的界限，前者对后者主要采取屏蔽和防范等措施。同样道理，中亚国家也不可能进入欧盟“秩序本位”体系，无论是地域，还是制度和文明，都显得风马牛不相及。这也决定了欧盟对于中亚地区来说，战略主要依托于“间接范式”。

这种“间接范式”主要通过俄罗斯产生物质性作用力，即当俄罗斯遭受到来自欧盟更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会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和干预。前文提到的俄美在中亚地区博弈出现逆转，虽然主要原因在于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颜色革命”，但与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也不无关系。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则明显更具“政治色彩”，毕竟这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与欧盟平均水平相去甚远，这更加坚定了俄罗斯主导中亚地区、防范西方国家势力的决心。2007年，也是欧盟开展与中亚国家“新伙伴关系”的元年，不仅延续了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就存在的欧盟援助，更是通过《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实现了援助模式的“制度化”^①。欧盟仍然没有将中亚战略凌驾于美国战略之上，实际上很多目标都是在维护能源安全和地区安全，尽管这里距离欧洲较为遥远，对于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重中之重。

此外，欧盟与中亚地区之间的“间接范式”还表现在欧盟配合美国进入中亚方面。众所周知，乌克兰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2013年11月28—29日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联系国会议，正是由于亚努科维奇缺席了这次会议，才引发了国内亲欧阵营的持续抗议示威，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事实上，处于两难选择的不仅仅是乌克兰。在“东部伙伴关系”六个国家中，亚美尼亚最终选择了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而白俄罗斯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盟友关系，实际上只有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三个国家对于欧盟的态度比较积极。同样，欧盟也非常看重高加索地区，认为这是从欧洲和土耳其方向打开中亚的一扇大门。俄罗斯方面对此反应非常激烈，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俨然将此变为一场激烈的“零和博弈”^②。

尽管欧盟与美国同属于西方国家集团，在地区安全和能源方面也有着较为接近的战略利益，但细节之处仍有所不同。美国希望控制中亚地区的能源

生产和运输，而欧盟则主要侧重于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来摆脱对于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可以说，美国看重的是“能源存量”的意义和作用，而欧盟在“能源流量”方面显得更加务实。另外一个不同发生在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之后，虽然美国和欧盟都对乌国处理事件的方式进行了严肃的抗议和抨击，认为在平息事件过程中乌政府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准则”，但此后欧盟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实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制裁，美国却并没有什么具体动作。这种分歧可以充分说明，美国当时更加在意是否会因为“安集延事件”失去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中亚“好伙伴”，从而影响到整个中亚战略大局，而欧盟更加在意的仍然是秩序，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政治体制，也包括在地区安全方面所应当采取的控制措施。

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雄踞中亚地区的世界大国，都与欧盟的“间接范式”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可见欧盟与中亚的关系不能不得到重视，仅仅是“秩序本位”使其在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方面显得有些“薄弱”而已。因此，尽管欧盟对于中亚影响属于“间接范式”，但对于大国战略博弈的平衡来说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俄罗斯（苏联）的“区域本位”与“弹性范式”

二战后，1946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先是向美国国务院发出8000字长电报，次年则匿名在《外交》杂志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提出“显然，美国不可指望在可见的将来与苏联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③。当然，同为世界霸权国的苏联也确实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其间，赫鲁晓夫时期美苏之间曾经出现“古巴导弹危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最终消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自我控制”。除此之外，苏联的霸权行为具有很明显的区域特点。当时的中亚五国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加上里

^① 这方面，可以参见曾向红博士撰写的系列论文：《论欧盟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度框架及其演变》，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欧盟在中亚地区所面临的挑战解析——欧盟新中亚战略出台背景透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6期；《试论欧盟中亚战略的演变》，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② Троицкий М., Чарап С. Дилем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оябрь 2013, № 5.

^③ [美]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张小明译，载《政治研究》1988年第1期。

海国家、高加索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构成了苏联的区域版图。在这个苏联已经掌控的区域周围，西向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东向则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联战略发展方向也基本沿着东西两部的边界向南发展，其战略方向直指太平洋和印度洋。显然，苏联并不满足于波罗的海、黑海、里海这样距离大洋遥远的水域，寻找一个可以通过海洋的不冻港，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战略价值。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的胜利、南北朝鲜分治，苏联沿此线向太平洋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并且，自1952年苏联将中长铁路（哈尔滨经长春到旅顺的中东铁路支线）归还给中国后，依托旅顺港，出渤海，进入太平洋的计划也彻底搁浅。对于印度洋这个苏联海洋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海域（其在此没有海军基地。当时苏四大舰队分别为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苏联如果挺进必然需要陆地上的雄厚基础。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动阿富汗战争^①，实际上是苏联依靠中亚地区的优势，希望打通阿富汗、巴基斯坦通往印度洋的陆地通道。这样的简单概括，可以展示出苏联时期“区域本位”的基本轮廓，即中东欧、东北亚和中亚南部地区。

苏联解体后，“大国崛起于地区守成，消失于世界扩张”这个道理必然会被俄罗斯所铭记。在综合国力相当困难的经济政治转型初期，俄罗斯所能照顾到的区域实在有限，控制力也明显减弱。在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得主要关注其“近邻”了（也就是原苏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②。在对待“后苏联空间”问题上，随着俄罗斯启动富国强军之路，对外战略的“区域本位”再次回归，只不过此时的“区域本位”范围与苏联时期相比明显小了很多，但在战略“范式”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军事和地区安全方面，无论是2008年俄罗斯直接将坦克开入格鲁吉亚，还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在毗邻边境地区展开“军事演习”，都与苏联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行为如出一辙。对于“区域本位”之外的地区，2015年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组织”与苏联在朝鲜战场上退居幕后的做法也有着相似之处，就是尽量不深度参与其中，采取的措施相对灵活，只提供空中支援或打击。这

说明，尽管不是在本土范围之内，但如果战略区域受到挤压或挑战，俄罗斯（苏联）都会采取强势的战略对峙方式。由此可见，在“区域本位”基础上的战略“范式”具有明显的弹性特征。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苏联强大之时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但在综合国力下降之际也会采取独善其身的做法。俄罗斯在独立初期对于独联体的态度相对漠然，对待卢布区更是采取“甩包袱”的态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加之中亚地区开始组建游离于俄罗斯之外的地区合作组织的时候，俄罗斯又很快对中亚进行区域整合，直至近年来将“关税同盟”坐实，再“三步并两步”地升格为“欧亚经济联盟”。这说明，当前俄罗斯在“区域本位”基础之上的“弹性范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身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这与区域内弹性势能成正比例关系；二是来自于区域外部的压力增大，也会引起俄罗斯在区域范围内加强战略力量。这种特征，在苏联时期与当代俄罗斯之间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仅仅在于区域范围和弹性强度，而并非战略的本质属性。

（四）中东国家的“宗教本位”与“传播范式”

二战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世界并没有彻底摆脱战争困扰，中东地区几乎可以用影响世界和平的“火药桶”来形容。在伊斯兰教的世界中，“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③。如果说二战后亚洲国家基本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而实现了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基本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在中东地区则截然相反，甚至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教随国定”都不能遵从。而这恰恰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后，交战各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根本动因。就连巴基斯坦、埃及这些曾经被西方国家殖民过的国家，独立后“宗教”仍

① 1979—1989年，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苏联为了获得波斯湾的石油资源以及通往印度洋的陆地通道，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然而，这十年战争使得阿富汗境内各种游击队层出不穷，苏联解体后，阿富汗国内大部分地区都被塔利班（学生运动组织）控制，而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也曾经支持过塔利班政权，十多年后这里却成为了美国的“反恐主战场”。更为形象的描述可以参见[美]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陈玉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25页。

然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在中东地区，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虔诚与敬畏要远远超过主权国家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美国的支持下，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随之就接连爆发了两次中东战争，至今约旦河流域的宗教鸿沟都无法彻底消除。

冷战时期，苏联的民族宗教政策基本来自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挡在了版图之外，因此中亚五国的穆斯林，与西亚北非地区相比虔诚度相差很多。“宗教本位”实际上绕过了“中亚五国”，沿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方向逐渐传播。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国家“宗教本位”的影响开始全面向中亚挺进，其中不乏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国家分裂势力。这实际上就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本位”，影响中亚地区的“传播范式”。当然，作为多民族聚居的中亚五国所受到的“宗教本位”影响，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存在明显不同。毕竟，这五个国家曾经被纳入到同一个联盟版图中，除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五个民族外，还有大量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此外，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范式，在经历了不同文化影响后，也存在着“世俗化”与“本土化”两大趋势，使得中亚伊斯兰教与中东地区存在一定差别。恩格斯认为宗教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存在关联性，“伊斯兰教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①。而在中亚地区，历史上主要的生产方式除了游牧之外，还有大量农耕，中亚地区最早采用“刀耕火种”的农耕模式，并迅速向世界传播。在农耕条件下的伊斯兰教具有自身特点，例如在服饰上就与中东地区不同，如果选择了长袍和蒙面，必然会影响到田间耕作^②。因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本身与中东地区有所不同，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历史习俗。

来自中东地区“宗教本位”的“传播范式”，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2010年底至2011年初从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一波冲击西亚北非的浪潮随即风起云涌，不仅直接在埃及和利比亚先后引起政府更迭和国内动荡，对于周围伊斯兰国家也产生很大冲击。伊朗曾经呼吁伊斯兰世界联

合起来，共同对这波冲击进行抵制。而紧邻中东地区的中亚国家同样被这股浪潮所波及。因此，在“宗教本位”的“传播范式”中，实际上有两种影响力：一是宗教极端势力，二是针对政府当局的伊斯兰社会思潮。

（五）中国的“关系本位”与“伙伴范式”

在中国对外关系和战略中，有着明显与世界其他大国不同的理念，例如追求和平崛起、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等。这样的中庸之道，不仅体现在当前，也是中国一贯遵循的基本外交理念。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又在万隆会议上表达了“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1972年毛泽东在国内外局势已经处于“备战、背荒”的艰难历史条件下，做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批示。邓小平对于中国也有“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外关系却始终坚持一贯的本质理念。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被概括为“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③和“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④。有学者认为这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内的中国理念，这种理念与传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比，它的不同之处在于过程建构中“关系本位”决定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和权力^⑤。这种“关系本位”外交模式自然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伙伴范式”。现实中的确如此，中国在多边领域的外交进展，远不如在双边关系中所取得的成效明显。在“伙伴范式”中，不同双边关系具有等级，例如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在中国“关系本位”中，本身具有内在的激励措施，实际上这也是促进“伙伴范式”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的根本动因。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外交与合作中，“关系本

^①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② 祖木来提·阿不力克木：《是谁想遮蔽维吾尔族姐妹的美丽》，载《新疆日报》2013年7月19日。

^③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④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载新华网2013年10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17591652.htm

^⑤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位”与“伙伴范式”体现得尤为明显。自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始终稳步发展，近年来得到迅速提高。2013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全面提升双边关系，先后将中塔、中土、中吉之间的双边关系提高到战略伙伴关系层级，中哈关系则提高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加上2012年中乌之间已经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伙伴范式”已经实现全面、深度、有效的覆盖。如果从“关系本位”与“伙伴范式”视角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也为中国探索对外战略起到了极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例如，“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就是由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达成的。因此，以“关系本位”和“伙伴范式”来定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应当比较准确。并且，这种“伙伴范式”使中国在中亚地区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既可以提高深化双边关系，这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也可以在稍低层次上开展务实合作，这一点在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土国是一个早就获得中立地位的国家，2005年后游离于独联体之外。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分为几个层次，一是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并确保中国能源安全；二是实现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三是地缘政治和边界安全^①。中国采取的战略是通过建立“伙伴范式”，发展双边关系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战略目标。

三、“本位与范式”在中亚地区的“回归”和“解构”

前面的分析，实际上是在抽象掉中亚地区的地理、国家、文化等因素，总结出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五种影响的“本位与范式”，接下来的任务是将这两个抽象性的概念“回归”到中亚地区版图进行解构分析，充分考虑各国的基本情况与外交取向。

为了实现“回归”任务，需要进一步厘清五种影响之间的关系，其中“范式”属于方法，“本位”属于立场和目标，因此主要考察五种“范式”对五种“本位”的作用。但是，正如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因素无法量化一样，这里的“范式”也属于“无量

纲”概念，虽然有强弱之分，但在多重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博弈中，实际上很难辨别清楚和准确衡量。因此，我们借用一个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概念，即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物品则兼具竞争性和排他性，大多数商品都具有这样特点），任何人使用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使用，边际上成本为零，例如海洋上的灯塔。准公共物品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即这种物品的消费者或使用之间不会形成竞争关系，但任何人使用都会影响到其他人使用，例如俱乐部中的会员，虽然不产生竞争，但会员对于俱乐部的使用却具有排他性；另外一类则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虽然消费者之间不构成彼此替代，但却有竞争关系存在，例如一个池塘如果有很多鱼，虽然不会驱逐出鱼，但这种拥挤却酝酿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在大国战略中存在着竞争性和排他性，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有着很大不同，为了能够使概念清晰和形象，可以回顾几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二战后美国和苏联针对当时欧洲先后实施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两大战略之间既有竞争性，也有排他性，最终使西欧和东欧之间竖起一道铁幕。第二，“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战略对峙具有竞争性，但在太空中却并不存在排他性，即近似于“池塘模式”。第三，在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中，很多地区组织都对外部力量持防范态度，尽管有些并不构成竞争。例如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尽管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态度，却仍然被排除在外，这就属于没有竞争性而具有排他性的战略，即近似于“俱乐部模式”。

在本文所讨论的五种“本位和范式”中，根据前文所做的概括和分析，也可以用竞争性和排他性来研究五种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五种影响的“范式”，是否对于其他“本位”构成竞争性或是排他性，具体关系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范式与本位之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分析中，并不存在对称关系，即如果干预范式对关系本位具有排他性，并不意味着伙伴范式对霸权本位也具有排他性，因此表格中共有20对竞

①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争和排他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宗教本位”几乎在任何一种范式影响下,都属于“非竞争/排他”关系,而其“传播范式”也对其他“本位”产生排他性,因此不能将其认为是存在于中

亚的博弈范畴,而应当仅仅是对中亚地区所构成的一种影响范畴。这说明在分析博弈时,不需要考虑这种力量,因为其他大国对其已经持较为统一的意见和看法,为此在表格中特意用“楷体字”标出。之所以将这种影响考虑进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说明大国之间的博弈,并非没有共同点;二是因为这是分析中亚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本文在定义外部世界时,没有用“博弈”,而使用“影响”的原因。而在“关系本位”所遭遇的三种“范式”影响时,明显处于“弱博弈”特征,并且“伙伴范式”对其他三种“本位”的“竞争排他性”也并不强,这说明中国对中亚施加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而政策措施相对柔和。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尽管美国和欧盟在中亚政策方面处于联合状态,但是在对其他“本位”影响方面,“干预范式”和“援助范式”明显不同,前者属于“强博弈”状态,而后者却属于“弱博弈”状态。这样,如果切入到大国博弈这个话题,实际上相当于讨论俄美之间的“范式”较量,而从表格中也可以看到这两国战略之间都处于“强博弈”状态。如果分析中国在与俄美两国战略交织中呈现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中国与俄罗斯更容易实现合作,而与美国方面则存在较强的“竞争排他性”。

前面的总结,实际上是为将五种“范式”准确地“回归”到中亚地区上来,因此尽量梳理其中关系,以尽量实现将“错综复杂”变为“简单明了”。尽管在研究中经常将中亚五国看作一个整体,但如果深入讨论外部世界与中亚地区的影响,必须充分解构中亚地区,即落实到具体而详细的地理版图上来,才能更加清晰展现全貌。因此,接下来的讨论应当重视“中部亚洲概念中的国别”和“中央亚洲概念中的地理”,而不是继续用抽象的办法来关注

表1 五种“本位和范式”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关系

	霸权本位	秩序本位	区域本位	宗教本位	关系本位
干预范式		非竞争/非排他	竞争/排他	非竞争/排他	竞争/排他
援助范式	非竞争/非排他		竞争/非排他	非竞争/排他	非竞争/非排他
弹性范式	竞争/排他	竞争/排他		非竞争/排他	竞争/排他
传播范式	竞争/排他	非竞争/排他	竞争/排他		非竞争/排他
伙伴范式	竞争/非排他	非竞争/非排他	竞争/非排他	非竞争/排他	

其整体。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中俄两国在中亚最为倚重的国家,美国在此地域并不占优势。2008年,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年度报告中,曾经这样评价中哈关系:“中国提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带动沿途国家与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覆盖了哈萨克斯坦……如果北京政策能够影响到阿斯塔纳,其他中亚国家不仅会在经济方面融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俄罗斯排斥该计划,占据地理位置优势的哈萨克斯坦,也会成为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缓冲带。”^①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俄美三国在哈萨克斯坦博弈与竞争进行的全面概括。但是,其中关于中国将通过哈萨克斯坦主导中亚的观点却显得有些唐突。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在中亚的重要盟友,这种紧密关系也是欧亚联盟向前进的最大优势^②。应当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这得益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两国多年来不断发展的双边关系,但若论人文、地缘、政治等领域,中国还无法与俄罗斯相比。俄哈两国有着7500千米的边境线,2003年双方启动跨境与地区合作,此后两国关系驶入“快车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哈两国都深刻认识到经济过度依赖外部世界的负面作用,因此开始强调地区间合作的意义^③。此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筹建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俄哈两国多年来积

① Сыроежкин К. Л. Казахстан-Китай: от пригранич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партнерству, Алматы: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К, 2010, С. 12.

② 赵华胜:《浅评中俄美三大战略在中亚的共处》,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

③ Николаев С. Россия-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граничное 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0. № 11. С. 49-57.

累的跨境和地区合作经验,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尽管近年来中哈关系发展势头迅猛,务实合作取得效果,但总体而言,中国尚没有对俄哈关系构成挑战。哈萨克斯坦也是力求在中俄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需要保持与俄罗斯的长久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来自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如果从哈萨克斯坦视角对中俄美三国战略进行比较,美国明显处于劣势,如果考虑到中俄之间在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合作以及“一带一盟”的全面对接,美国更是无力扩大在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地位。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有3100万人口(80%为乌兹别克族),大约相当于中亚五国总人口的一半。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双重内陆国家^①,同时也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与其他四国都接壤的国家。中国不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但仍然是乌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俄美在乌国的激烈博弈相比,中乌关系可谓不温不火。如果说哈萨克斯坦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在中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的话。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在俄美之间寻求外交平衡,而每次“站队”背后都有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最初,乌兹别克斯坦选择了美国支持的“古阿姆集团”,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国内极端宗教势力活动日益增多,“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组织”发展壮大,费尔干纳盆地所积累的民族、宗教、社会矛盾已经威胁到乌政权稳定。乌兹别克斯坦于是开始向俄罗斯靠拢。由于21世纪初俄罗斯对于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基本持支持态度,因此乌美关系开始以出租军事基地的方式逐渐发展。“颜色革命”和“安集延事件”使乌兹别克斯坦担心西方世界对其政权稳定的挑战,在饱受美国制裁后开始疏远美国,收回军事基地,外交重点再次转向俄罗斯。2012年6月4日,刚刚重新当选总统的普京,选择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访问中亚的第一站,足见俄罗斯对于乌国的重视。然而时隔不久,6月28日乌兹别克斯坦宣布暂停在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国资格^②。俄乌关系“趋冷”这个“不能说的秘密”瞬间公布于众,这标志着乌国再一次选择向美欧西方国家阵营靠拢,是在以此向俄罗斯表明态度。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取向的“嬗变”,无疑给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添加了更加复杂的变量,但总体上看,仍然属于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或是

基于安全因素考虑,或是基于政治形势考虑,当然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至于说其中决定性因素,当属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的政治体制。应当说,恰恰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2年设立,10年后的2002年改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事保障,才使中亚国家领导可以获得事实上的终身制,而其中最为强大的俄罗斯,则相当于为这些国家稳定提供基本军事保障。但是当国内政治形势稳定时,乌兹别克斯坦对于俄罗斯的依靠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受到威胁时,则又会迅速向俄罗斯靠拢,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国家外交取向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形势的需要问题。因此,“颜色革命”和“安集延事件”使俄乌关系开始紧密,而在摆脱国内政局不稳的威胁后,俄罗斯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吸引力就不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大了。虽然看起来乌摇摆于俄美之间,但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始终是美国在中亚关系最为良好的伙伴,对于美国发展中亚与南亚的衔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唯一发生过“颜色革命”的,首都比什凯克和奥什在2010年均发生过严重骚乱,此后吉国开始变为中亚国家中唯一的议会制国家。历史上,沿着丝绸之路古道,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曾经联系密切,今天吉国境内的托克马克,在唐代时期曾经隶属于中国,当时的碎叶(托克马克)与疏勒、于阗、龟兹统称为安西四镇,碎叶城也因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出生地而广为流传。然而,若论大国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中国却并不明显,中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发展经贸合作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重视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新疆有着近二十万跨境民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和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争夺可谓紧张激烈,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影响力更为直接,而美国则显得比较间接,主要采取非政府组织影响社会思潮和执政当局的办法。俄罗斯

① 内陆国是指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双重内陆国家即是周边邻国也是内陆国,说明其远离海洋,另外一个双重内陆国是欧洲小国列支敦士登(面积只有160.5平方千米)。

② 曾向红:《乌兹别克斯坦与集安组织的曲折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

③ 事实上,克林顿政府曾经支持塔利班政权,就是希望建立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而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乌兹别克斯坦的作用更加突出。См.: Иван. Сафранчук, Концепция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Больш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Июль 2013, № 7, С. 43-53.

在吉国拥有驻军，既协助稳定边防，也相当于实现了对政局的控制。在总统制时期，俄罗斯力量基本可以确保总统“亲俄”，然而在“颜色革命”之后，阿卡耶夫政权在美国策动下被推翻，时隔五年俄罗斯又借助比什凯克骚乱，赶走了巴基耶夫。如今，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主要依靠议会制下的总理具体负责。参与议会的政党，大多以吉国传统部族为基础，从而使这种表面民主的体制下，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近年来俄罗斯明显加强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关系，在安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两国关系被推向更高层次。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的非突厥族系国家，也是中亚五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国家，严重的社会安全形势，边境地区的维稳压力，使俄罗斯驻军对于塔吉克斯坦来说不可或缺。塔国属于较为传统的中亚政治模式，现任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已经连续四次当选总统，本届任期到2020年。从这种政治模式不难看出，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民主输出构建的干预和影响，很难被塔吉克斯坦高层所接受，因此在外交取向上必然会依靠于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接壤，尽管在新疆也有五万塔吉克族，但属于高山塔吉克人，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的平原塔吉克人不属于一个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别。中塔关系发展，更多依靠中国经济援助、项目投资来保持。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的中立国家^①，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美国、欧盟都极为看重土国。与之相比，俄罗斯所拥有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控制中亚地区的天然气运输管道，实现对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和控制。

如果从整体上看中亚五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除了前叙述各国所表现的特殊性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都不甘于“人微言轻”的外交地位，选择在大国战略之间寻求平衡。此外，中亚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具有防御性，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中亚国家也会采取一定的抵制措施和防范态度，外部影响力越大，排斥力也随之增加。例如，美国和欧盟原本希望借助于民主和人权，推动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但很多国家都

认为这会影响到政局稳定，因此普遍表现出抵制和排斥态度。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影响的最大优势，应当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地区影响，然而中亚国家既由此产生依赖，同时也会产生担忧，尤其在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国家更是对俄罗斯这个军事大国心存顾忌。事实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距离和关系，始终是敏感话题。2011年，苏联解体20年之际，普京曾经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试图恢复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应当说，前半句所表现出的“怀旧”，符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现实情况，而后半句所表现出的“清高”，实际上也是在努力打消中亚国家对于俄罗斯过于强大的担忧。在中国方面，虽然中亚国家希望通过经贸合作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有关“移民”、“能源”、“倾销”等敏感词语，仍然会被一些社会舆论频繁提及，其中无不隐含着强烈的防范心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中亚国家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外交取向，才使得围绕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和外部世界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

四、历史地理与现实逻辑的契合

前面的分析，主要是分别基于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五种影响的本位与范式，结合发展经历和中亚国家的现实情况进行的，为了更加清晰地进行总结，最后需要加入历史和地理的分析方法。

在中央亚洲的地理范围上，从俄罗斯方面看，可以沿着陆地进入海洋的通道有三条，这也恰恰是彼得大帝为俄国构建的帝国版图，尽管据说俄国后人在1775年发现了这个宏大的战略愿景，然而此后数百年来却从未实现过。具体说，第一条是从黑海经过土耳其沿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现大多称之为伊斯坦布尔海峡），抵达地中海，可以说这是一条大西洋方向的梦想；第二条是从高加索山脉以南，穿过伊朗高原，向着波斯湾方向挺进；第三条是穿过中亚和阿富汗，向着印度洋方向发展。现在看来，在大西洋方向上，土耳其已经成为北约成员国，本来狭窄的伊斯坦布尔海峡，俄罗斯已经很难

^① 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土国申请。

掌控。在波斯湾方向上,雄踞高原地区的伊朗,更是难以逾越。实际上只有从中亚和阿富汗向印度洋方向的线路更加现实,为此苏联曾经极力控制阿富汗,甚至不惜发动阿富汗战争。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及“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这一线路也沉寂在历史记忆之中了。当然,俄罗斯不可能完全放弃这条战略地理线,仅仅是由于国力所限,适当收缩战略纵深,反而产生了对中亚地区更加强烈的控制欲和影响力。如果从这个地理视角概括,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方向是由北向南。在这个方向上,俄罗斯具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优势,乌拉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向都是南北,只不过前者由北向南注入里海,后者由南向北注入北冰洋。乌拉尔河流域为俄罗斯与里海周围国家文明交融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也象征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渊源与传统。与之相比,额尔齐斯河由于在俄罗斯境内从乌拉尔山东部注入北冰洋,并非俄罗斯欧洲版图部分,因此中亚地区文明对俄罗斯影响较小。

而美国的方向则恰恰相反,是从阿富汗出发逐渐向中亚腹地延伸,由南向北发展,并且这条道路并不宽阔,西面有美国无法撼动的伊朗高原,东面则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共同管理的帕米尔高原。事实上,美国的南向北战略,在东西宽度方面已经非常狭窄。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已经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构成了南北方向的争夺。

需要注意的是,中亚地区两条著名的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实际上早已将中亚五国分为南北两部,历史上曾经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当前则几乎可以看作美欧俄战略对中亚争夺界限。在北部的哈萨克斯坦,自从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之后,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安全,基本已经远离中亚南北分界线,更向俄罗斯方向靠拢。处于两河平原之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则在南北之间不断选择,变换角色。吉尔吉斯斯坦则被锡尔河分为南北两部,不仅是首都比什凯克与南都奥什之间在民族构成、宗教特点等方面存在差异,更是颜色革命和国内骚乱爆发的根本原因。阿姆河在塔吉克斯坦境内虽然没有泾渭分明地制造南北差异,但分布在河流沿线的不同部族,实际上也存在内部纷争和矛盾,只不

过没有特别清晰地表现为南北问题而已。

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大国战略的走向分析,还是从中亚地区山川与河流的走向分析,中亚地区的南北问题基本呈现出较为一致性的规律和特征。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概括,最大的优点在于形象和具体。

再来看中亚地区的东西方向,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欧盟对中亚地区影响,则主要通过里海周围国家来施加,因此在方向上属于自西向东。如果美国和欧盟能够在战略上实现衔接,那么对于“霸权本位”和“秩序本位”来说,两者的合力显然是一个“ $1+1>2$ ”模式。而在由东往西方向,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本位”,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是两条重要跨境河流,这使得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始终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哈国也是中国在中亚最为倚重的伙伴国。而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之间,不仅没有河流,反而隔着巨大面积的帕米尔高原,因此尽管边境接壤,但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都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自西向东传播的还有“宗教本位”,然而在乌拉尔河—里海、伊朗高原的阻隔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世俗化程度明显高于阿拉伯世界,再经过天山、帕米尔高原阻隔,中国新疆伊斯兰教也具有本土特点,加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本位”在向东延伸时同样受地理环境约束。当然,中亚地区也存在“东西问题”,近年来主要反映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上下游之间对水资源的争夺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区矛盾。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中亚看作一个板块,沿着里海低地向帕米尔高原划上一道45度角的斜线,那么在东北部分,应当是中俄两国密切配合的战略空间,并且占据优势地位,而在西南部分,则是美国和欧盟极力争夺的地区,俄罗斯对此已经采取限制态度和防范措施,因此决定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关键国家必然是处在中心位置上的乌兹别克斯坦。

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前文所述的理论逻辑上分析外部世界对中亚地区的五种影响,还是从地理历史视角出发进行分析,都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或是近似性,或许只有将二者尽量缜密地结合起来,对于中亚地区未来发展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和准确。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Standard and Paradigm: Five Types of Influences of Outside World on Central Asia

Zhu Honggen, Wang Zhiyuan

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Cold War", superpowers' games regarding Central Asia were staged in succ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actively in Central Asia and even brought forward the magnificent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after 9·11 event. Soon afterwards, the United States was excluded collectively by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le China developed bilateral partnerships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teadily. With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superpowers China, Russia and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Islamic regions in the west and European Union in the north, the influences of the outside world on Central Asia hav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In order to probe further into this issue, it is required to seek "standard and paradigm" which has regularities in a relatively broad space and long period; on this basi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Central Asia's features in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diplomacy, etc, the influences of outside world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can be judged relatively accurately.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uperpowers' games; regional safety; standard; paradigm

Стандарт и модель: пять видов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Чжу Хунгэнь, Ван Чжию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чинается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активный разворот США в сторону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а после событий 11 сентября 2001 года Вашингтон выдвигает концепцию “Больш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позже встречает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вытеснение” из региона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Китай, имея лучше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развит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табильно развивает партнер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сем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й трех держав -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и Америк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 также влияние Запада на исламский мир (исламский регион) и Севера на Евросоюз еще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осложнили понимание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Для более углублен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этой проблем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йти 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в более длительном временном отрезке имеющи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стандарт и модель” и на этой основе соединит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и другие внутренн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рисущ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у региону, что позволи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ч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влия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на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и в целом проследить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сего регион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тандартная модель